

# 简论西方女性文学的发展

王晓英\*

有人说 21 世纪是女性文学的世纪,这个说法是否预言了事实只能由未来见证,但它至少反映了当今世界女性文学的辉煌成就、蓬勃生机和发展态势。女性作家们活跃在文学的舞台上,从浅表的意义上来说给这个长久以来由男权话语统治的人类精神园地带来了更加丰富的果实;从深层的意义上说促进了人类两性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谐共存,从而提升了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通过女性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欣慰地看到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西方女性文学的历程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西方女性文学的发展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变迁。正如艾丽斯·沃克在其著名的散文“寻找母亲的花园”中所说:我们的母亲和祖母们不是圣人,而是艺术家,她们内心有永不停息的创造力(29)。确实,女性自始至终都拥有艺术的创造力。在西方,女作家几乎与有文字记载的文学史同在。古希腊文学乃西方文学之滥觞,其间就有一位与荷马比肩而立的女性——被柏拉图称为“第十位文艺女神”的女诗人萨福。萨福一生写过九卷诗,但留存下来的只有两首完整的诗和一些残句,她用简洁自然的诗句写出了自己复杂的心理变化,受到西方历代诗人的推崇。然而,嗣后两千年的西方文学史中,从雅典的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至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顶峰莎士比亚,再到德国狂飙运动的倡导者歌德,在一连串我们铭刻于心的名字中间却难见一位女性。于是乎,上个世纪初,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著名的《一间自己的房间》里不禁对着女性作品尽付阙如的“空空书架”感慨万千:19世纪以前的西方女性要想写出一部天才作品几乎是难以成行的壮举,因为她连拥有一间属于自己房屋和足够维持生计的钱的最基本愿望都不能得到满足。不是女性失却了她们的艺术天赋,而是两千年来,西方女性在男权肆虐的社会里饱受性别歧视,艺术创造力受到严重压抑。在这样的处境中,她们有的“怀着压抑在内心的真正天赋离开人间”,有的“被内心永不停息的创造活力逼得几近疯狂”(沃克 29),虽然也有极少数女性通过写作使自己的才华得到流露,但其作品往往按照男权标准的衡量而被斥之于经典之外,最终埋没于岁月的尘封里。

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女性文学产生于 19 世纪。那是随着人权运动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在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及天赋人权等思想的影响下,从 19 世纪 30 年代起,西方开始了一场为女性争取教育、政治、法律和经济等方面权益的女权运动。与此同时,女性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了黄金时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性作家和作品。至 20 世纪 60 年代,女权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在对父权制思想文化本身提出质疑的同时,人们也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女性作家和她们的作品,不仅重新审视父权制传统下的文学经典,而且开始研究女性文学的意义。女性文学的理论研究也促进了女性文学的创作实践。如今,女性文学在西方的发展已呈波澜壮阔之景观,从历史到

\* 王晓英,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系副教授

现状 从精神到身体,从风格到题材,多元并陈,色彩各异,全面地反映了西方女性的生存状况和精神风貌 本文试以时间为脉络,对西方女性文学的发展做一简要梳理和评论

## 一、西方女性文学的滥觞

西方女性文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但根据目前的史料,这一时期有名望的作家无一为女性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编撰《诺顿女性文学选集》时,穷尽故纸堆才发现,英国中世纪留下笔墨的仅有三位女性:离群索居的女修士朱丽安(Julian of Norwich, 1342-1416),献身基督教的玛格丽·坎朴(Margery Kempe, 1373-1438),以及生平事迹不详的朱丽安娜·伯纳斯(Juliana Berners, 1388-?) 文艺复兴时代除了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一世,有作品见诸于史的还有玛丽·锡德尼·赫伯特——著名诗人菲里浦·锡德尼·赫伯特的妹妹,英国第一位出版诗集的女性伊莎白拉·惠特尼(Isabella Whitney, 1567-1573),第一位从女性角度改写圣经中人类堕落的故事艾米丽亚·兰叶(Aemilia Lanyer, 1569-1645),以及伊莉莎白时代最多产的女作家伊莉莎白斯·卡丽(Elizabeth Cary, 1585-1639),她17岁就写作了诗剧《玛瑞姆的悲剧》(*The Tragedy of Mariam*),这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由女性创作的全本剧本,描写了女性面对婚姻和男权的矛盾心理 这些女性作者都与王室宫廷和教会有密切的关系,而那里是当时女性唯一能够接受教育的地方

尽管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的自我意识还很不突出,但翻看这一时期硕果仅存的女作家的作品,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女性对平等权利的渴望 如朱丽安将基督定义为母亲,赫伯特将伊莉莎白女王比作上帝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被称为欧洲最早的女权主义者的法国15世纪的女作家克里丝蒂·德·皮桑(Christine de Hsan)所著的《女土城》(*La Cité des Dames*),该书前所未有地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女儿国,在那里不同年龄、不同国籍的杰出妇女们聚集一堂,尽显女性才华与成就 这些内容在当时无疑都具有离经叛道的色彩 西方女性文学起步于17-18世纪,这时期的西方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写到:“18世纪末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比十字军东征或者玫瑰战争更为重要 这变化就是,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作了。”(刘炳善 504)尽管在当时,女性写作大多被主流文学嘲笑和批评,但作为职业的写作毕竟向为数不多的女性开放,成为她们可以为自己挣得一点经济收入的途径 这时期在英国出现了第一位职业女作家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 1640-1689),还出现了女性主义思想的最初硕果: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的《为女权辩护》

在写作体裁上,17-18世纪流行的经典诗歌模式远远不能满足女作家对妇女生活的描写需要,而小说的形式却很好地适应了这种题材 从那时起,女性与小说之间就有了特殊的密切关系 在解释为什么19世纪早期所能阅读到的妇女作品大都是小说时,伍尔夫指出,由于“妇女所获得的全部文学训练,均在于对性格的观察和对情感的分析 几个世纪以来,她的情感一直受到公用的起居室的种种影响的教化 人们的感情给她以深刻的印象,个人的关系始终展现在她的眼前 因而,当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作时,她自然就写小说”再者,“当妇女成为作家时,所有的旧的文学形式已根深蒂固,固定难变 只有小说尚年轻,运用起来还柔软可塑”(刘炳善 527)可以说,女性文学最初的、也是最大的贡献是在小说方面 在此仅举几例:法国作家拉法耶特夫人(Madame de La Fayette, 1634-1693)的《克莱芙王妃》(*La Princesse de Clèves*)不仅宣告了“法国式”小说的诞生,而且书中对人物精微细腻的心理分析还使之成为欧洲第一部完整的心理小说 英国作家阿芙拉·贝恩的《奥鲁诺可》(*Oroonoko*)被称为英国的第一部小说,同时也是欧洲第一部批判

奴隶制的作品 德拉瑞维尔·曼蕾 (Delarivier Manley, 1663- 1724)的《瑞维拉历险记》(*Rivella*)开创了女性自传体小说的先河 被亨利·菲尔丁称作“小说夫人”的伊莱莎·海伍德 (Eliza Haywood, 1669- 1756)是 60余种出版物的作者,堪称 18世纪最多产的女作家 她的代表作《多余的爱情》(*Love in Excess*)是英国当时除《鲁滨孙漂流记》之外最畅销的小说,可谓女性写作畅销书最早的典范 范妮·伯尔内 (Frances Burney, 1752- 1840)的《伊夫莱娜》(*Evelina*)极尽人物形象塑造之才华,成功地描写了一位纯真善良少女的成长故事 安·瑞德克利夫 (Ann Radcliffe 1764- 1832)的《乌尔多福的奥秘》(*The Mysteries of Udolpho*)则是哥特小说的经典之作 由于这部小说的成功,哥特小说不仅作为一种小说体裁在英国确定了自己的地位,而且还深刻影响到其它一些国家,特别是德国和美国的文学创作 如今瑞德克利夫和她的作品已经成为了哥特小说的代名词

总之,19世纪之前的西方女性文学虽未呈洋洋大观的局面,但女性作家对文学的贡献已经成为西方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二、19世纪:西方女性文学的黄金时代

19世纪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女性文学产生的时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女性想象力得以驰骋的黄金时代 (Gilbert and Gubar 303)需要指出的是,这也是西方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转型时期 在这个世纪里不仅妇女生活状况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女性文学传统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 妇女已经相继取得了选举权、财产权、离婚后孩子的监护权,她们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从事医生、护士、律师、记者等职业,组织贸易会,创办企业,写作畅销书 妇女取得的多种成就显耀在世人面前,以至于到 19世纪末,所谓的“妇女问题”成了思想家们讨论的主要议题 正如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瑞·斯特瑞奇所言:“妇女运动的真实历史就是整个 19世纪的历史;那些年里发生的事情无不与这个进行着的伟大的社会变革有关,其产生原因也无不与它的影响有关。” (Gilbert and Gubar 283)就女性文学而言,作家人数剧增,涌现了一批才华出众、卓尔不群的女作家和许多经典作品 被伍尔夫称为英国最伟大的四位女作家简·奥斯丁、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和乔治·艾略特,以及著名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伊丽莎白·芭蕾特·布朗宁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等都生活在 19世纪

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起主导影响的依然是父权制下的女性观,妇女仍处于附属男性的地位 所谓理想的女性是纯洁无私、顺从男人、固守家庭的“家中天使”,而拒绝依附男人或因环境所迫而偏离所谓妇道的则被视为魔鬼 在这种女性观的制约下,女作家作品中也难以避免地出现对所谓女性美德的宣扬和非“天使”即“魔鬼”的女性形象 如美国作家路易莎·梅·艾可特的小说《小妇人》就是一部教导年轻女孩子如何当好贤妻良母的经典;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疯女人伯莎·梅森与端庄的简·爱的对比;伊丽莎白·芭蕾特·布朗宁的“诗小说”《奥罗拉·利》(*Aurora Leigh*)中邪恶的瓦尔德玛夫人与女主人公奥罗拉的对比等等 另一方面,女作家们由于困惑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表现出了一个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总结的西方女性文学独特的传统——对疯狂的表现 许多女性作家不仅以疯狂作为主题,而且是在自身接近疯狂的状态下写出大量描写女性痛苦体验的作品

19世纪的西方女性文学较 17- 18世纪显示了更加多样的艺术风格 浪漫主义即是一种 西方 19世纪初盛行的浪漫主义思潮显著影响了当时的女性作家,描写理想、抒发个人情感以及对大自然的歌颂也出现在女作家的创作中 英国的多萝西·华兹华斯和玛丽·雪莱即是这样的代

表 前者在日记中对大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描写,与其兄长威廉姆·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如出一辙,而后的《弗兰肯斯坦》则同其丈夫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关注着自由和权威、意志与想象之间的冲突。即使是认为“理智”重于“情感”的小说家简·奥斯丁,也不得不面对由浪漫主义引发的婚姻中的问题。而在夏洛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等作家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拜伦、雪莱式的英雄浪漫主义痕迹。简·爱对精神自由和地位平等的追求,既是拜伦式的对个人权利的争取,又是雪莱式的对社会改革的呼吁;在罗切斯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拜伦式的英雄,而充满反抗精神的简·爱和凯瑟琳当然也可以谓之拜伦式的女英雄。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女性更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史达尔夫人的《论文学》奠定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乔治·桑的小说则发展了法国的积极浪漫主义。

19世纪的女作家在揭示与批判社会现实方面并不逊色于男性作家。同时,她们又以女性特有的敏锐目光和审美意识来观察社会现实。简·奥斯丁的小说以幽微细致、幽默讽刺的笔法描摹了那个时代中产阶级的生活,从日常平凡的事件中揭示出普遍而深刻的道德涵义。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中对19世纪英国宗教的虚伪和人性的冷酷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玛丽·巴顿》等作品中批判了工业制度的残酷无情。乔治·桑的《康素爱萝》通过讲述女主人公康素爱萝的经历,描绘了一幅从威尼斯到维也纳,从上流宫廷社会到下层的农村的欧洲广阔的社会风俗画面,对十八世纪欧洲封建制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揭露。波兰女作家艾丽查·巴甫洛斯卡·奥若什科娃的长篇小说《涅曼河畔》被誉为“波兰现实主义小说的杰作”,作家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描绘了一幅19世纪波兰农村生活生动而真实的画卷。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南部奴隶社会的黑暗与落后,揭露和谴责了蓄奴制的野蛮与反动,为唤醒民众反对蓄奴制,以及推动废奴运动和南北战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批判社会现实问题的同时,女作家们更加关注社会现实中女性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她们一方面强烈控诉十九世纪妇女所受的社会压力和痛苦遭遇,另一方面开始试探着,但又是大胆地描写女性意识的觉醒,表现女性的深层心理感受。如果说《简·爱》等作品表达了19世纪西方女性独立的期望与女性性别角色的矛盾,体现的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女性意识,那么像美国女作家凯特·肖班描写女主人公追求婚外恋情的《觉醒》,夏洛蒂·帕金斯·吉尔曼揭示夫妻关系的性别政治的《黄色壁纸》等那样的作品则从更深层的意义上体现了与父权制格格不入的新女性意识。当然,女性意识作为男权意志的对立面得到广泛而深入的表现则是进入20世纪之后才真正开始的。

### 三、20世纪的西方女性文学

20世纪的西方,女性的权益得到空前增强。各国妇女不仅于20世纪上半叶全面获得选举权,而且进入了几乎所有的就业领域。在思想层面上,女权运动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平静下来,但到了60年代,在学生运动和民权运动的激发下,女权运动再度兴起。这次运动不单强调争取女权,更重视男女两性的角色分析,并开始对父权制思想文化本身提出质疑,出现了许多女性主义的理论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法国思想家兼文学家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和美国女作家蓓蒂·傅瑞丹的《女性的奥秘》。70年代,随着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发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以一种崭新的批评方式正式出现。与此同时,西方女性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女作家及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她们迫切要求以自身特有的生活经历和强烈的自我意识表达心声,以独特的视野和手法全面阐释妇女从觉醒到抗争,直到获取解放的历程。毫无疑问,这100

年间的女作家较之以前的女作家数量更多,成果更丰富,并且在继续发扬光大西方女性文学的优秀传统之余,更加凸现代女性文学的特质——即由女性作为书写主体,以女性感受、女性视角为基点而挖掘的女性经验

20世纪西方女性作家在文学艺术,尤其是小说艺术手法的创新上可谓功莫大焉。我们知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发轫于意识流心理小说。英语文学中的意识流小说始自英国的一位女作家——多萝西·理查逊(Dorothy Richardson, 1873-1957),她在以《人生历程》(*Pilgrimage*)为名的一系列心理小说中,通过别具一格的手法揭示了女主角米丽安在漫长岁月里流动不已、变幻莫测的意识,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从内容到技巧上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革命。弗吉尼亚·伍尔夫更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倡导者。她不仅是意识流小说的主要代表,也是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随笔作家,还是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先驱。从《雅各布的房间》到《达罗卫夫人》、《到灯塔去》以及《浪》,伍尔夫将意识流小说的形式与技巧发挥到了完美的境地,对整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起到了推动作用。将现代心理学理论运用到小说创作中的女作家还有英国的梅·辛克莱尔(May Sinclair, 1865-1946),她的小说特别关注潜意识中的欲望和这些欲望受到压抑后的结果,同时也特别关注鄙视肉体需求而片面提升精神理想的危害。在其代表作《三姐妹》中,她使用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来探究人物复杂而微妙的内心世界,这在当时极大地拓展了女性作家的视野。

被西方评论界称作“作家的作家”的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以极强的“先锋意识”著称,她的创作表现出一反传统的、奇异独特的文学风格,如把现代派绘画技巧应用到文学创作之中。小说《三个女人》就是斯泰因受到塞尚的一副女子肖像画的启迪而写出的;她的另一部小说《软纽扣》则被称为文学中的立体主义,斯泰因本人也因此被称作“达达之母”。法国女小说家娜塔丽·萨洛特是“新小说”的先驱人物,也是“新小说派”的主要理论家,被称为“新小说之母”。值得一提的还有新西兰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短篇小说上的技巧创新,英国作家安吉拉·卡特的魔幻现实主义,德国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在《卡珊德拉》中对神话的历史化重构等等。完全可以这样说,女性作家开拓了20世纪文学创作的新天地。

20世纪的女性创作与20世纪的社会政治问题紧密结合,在表现寻求个人归属、女性自我意识以及个人与国家历史的关系时取得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同时更细致地表现了女性从恋爱婚姻到生儿育女的生活道路,以及新一代女性在现代生活里寻求自我的过程中的矛盾心理。如果说19世纪的西方女性文学在于追求女性独立,追求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那么,20世纪西方女性文学则是表现独立以后的女性所面对的种种问题。

女性意识与男权文化的冲突是20世纪西方女性文学的重要题材,许多女作家都描写了追求自立的女性与男权文化的冲突以及女性的失败。如英国的多里斯·莱辛在其代表作《金色笔记》中就展露了自由女性的不幸,主人公安娜自诩为“自由女性”,但是她深切地意识到摆脱男性的约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另一位英国女作家费·韦尔登以《女魔的生活与爱情》为代表的系列作品也通过对现代女性复杂的生活经历的描写,揭露父权制传统文化对女性依然施加着的压迫。

20世纪女性文学在描写女性经验方面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全方位的境界。美国女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是第一位把生育的经验写进作品中的作家。加拿大的卡罗尔·希尔兹则透过生活的表面揭示女性生存的本质和意义,以及女性之间的友谊。英国作家艾瑞卡·琼致力于当代女性心灵的探析,直面女性对性爱的本能需求,主张女性勇敢追寻并构建独立自我。艾丽斯·沃克的著名小说《紫色》刻画了女人的成长、女性之间的互助,同时也探讨了男人的成长与产生变化的可能。

性

20世纪西方女性文学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性别意识与文化意识的交融。20世纪后期是多元文化既交汇又冲突的时代。女性作家由于对文化有着特殊的敏感,往往更能深切地感受它的影响,因而能更加细致、更加深刻地以自身的文化经历和性别、种族身份来表达不同的女性经验。对具有双重甚至多重文化背景的作家来说,对与本民族传统文化不同的文化的体验似乎成了激发她们想象力的因素,她们的创作过程常常也成为寻找身份和发现自我的历程。她们共同的创作主题常常围绕种族及性别所属的边缘文化和边缘身份的失落感,以及性别、代沟、文化间的冲突展开。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关注点是妇女问题,但同时也关注加拿大文化的独立。她在以《生存》为题的文学论著中主张加拿大摆脱英美文化的影响,发展自己的文学,从而振兴加拿大独立的民族精神。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致力于为黑人创作,探索生活在美国社会的黑人的喜怒哀乐,寻求美国黑人的文化之根。她向美国社会传达了黑人妇女的声音。其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挣扎在黑人的信仰和白人的价值标准、传统美国黑人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矛盾与冲突中,并努力寻求自己的身份和位置。美国华裔女作家也是展现多元文化特征的重要代表,汤亭亭的《女勇士》、谭恩美的《喜福会》等作品之所以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作者及其作品中所展现的多元文化特质。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为她们提供了可以言说的素材和富含隐喻的功能,使她们能够在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两个声音、两种语言之间,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视角,审视生命、关注存在。同时,她们又作为弱勢种族和边缘文化的代表,向强势种族和主流文化喊出了自己的声音。

时至20世纪末,女性生态文学成了西方女性文学中重要的一支。女作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特别关注也许是性别使然,须知女性和自然有着天然联盟。因为以男权为中心的世界奉行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在这个世界里妇女和自然同受其害。开创女性生态文学之先河者是美国女作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 1907-1964),她的代表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描述了农药灭杀各种生灵,把一个有声有色的春天变成了荒凉死寂的人间地狱的故事。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也被认为是生态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小说《浮现》让读者对人类杀戮动物的丑恶行径不寒而栗。目前在西方,女性生态文学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作家和评论家的注意。

总而言之,西方女性文学的发展自汨汨细流始,至今日之汪洋大观,其变化无不折射出西方社会、政治、文化的沧海桑田。它证明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可以使女性对人类社会做出难以估量的贡献;它也证明了从这个世界另一半人类的视角看过去,世界则是别一样的天地。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Gilbert, Sandra M. and Susan Gubar.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6.
- 刘炳善编:《伍尔夫散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
- [Liu Binshan, ed. *Essays of Virginia Woolf*. Beijing: China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2000.]
- 艾丽斯·沃克:“寻找母亲的花园”,汪义群译。《外国文艺》6(1994): 27-40
- [Walker, Alice. “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 Trans. Wang Yiqun. *Foreign Literature and Art* 6(1994): 27-40.]

责任编辑:章柳